



研究所简介
人才队伍
科研平台
学术活动
学术成果
国际交流
学术期刊
研究动态
教育培训
党群园地
公告
学术资源
联系我们
友情链接
关于我们
焦点议题
经典书目
新闻
学术动态

首页 > 经典书目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

译者: 刘阳, 冯钢

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07-5

ISBN: 9787213034435

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 1886-1964) 是20世纪公认的最彻底、最有辨识力的经济史学家。当法西斯主义兴起时, 他离开了出生的匈牙利, 成为英国公民。在其学术生涯中, 曾先后在牛津大学的本宁顿学院和伦敦大学教书。著有《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大转型》和《达荷美和奴隶贸易》(与A. 罗特施泰因合作)等作品。

《大转型》是针对将西方文明表现得淋漓尽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写的。战争期间, 盟国的喉

舌将所有祸根归咎于“专制国家”和“军国主义”，流行于民间的理论更是局限于就祸端谈祸端。犹太人卡尔也是纳粹的受害者。然而，在理论思考中，他表现出一种特殊的超然和冷峻气质。对于卡尔来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与19世纪西方文明的“百年和平”构成鲜明的反差。19世纪出现西方文明编年史中没有先例的现象，这就是1815年至1914年之间的“百年和平”。是什么因素造就了19世纪的“和平百年”？又是什么因素在20世纪一开始就摧毁了西方世界的和平？与卡尔同时代的理论家，大多从那些有损于“和平百年”之制度基础的种种潜在因素中去寻找答案。而卡尔则完全相反，他坚信“和平”与“战争”有着必然的历史联系。在他看来，“百年和平”并不是因为19世纪不存在冲突的原因，而是因为19世纪的西方文明出现了一种对和平的热切兴趣：贸易在这个世纪里史无前例地与和平连接在一起。

19世纪的西方文明奠基于四种制度之上：其一，确保破坏性战争免于发生的权力平衡体系；其二，象征着世界经济组织的国际金值标准；其三，创造了空前财富的“自我调节市场”；其四，自由主义国家。这四种制度各有作用。但是，它们的源泉和母体是“自我调节市场”。正是“自我调节市场”生发了19世纪西方文明，其他的制度都属于这个创造的附属品（国际金值标准无非是让国内市场国际化的手段，权力平衡体系无非是在国际金值标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带有自由主义国家无非是自我调节市场的造物）。

在人类经济史上，“自我调节市场”（the self-regulating market，也即波兰尼所说的“大转型”）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创造。这种经济类型能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组织经济生活，而其他的经济形态则从未能脱离社会对它的制约。在部落和早期文明社会中，个人的经济利益从来没有成为社会的最高追求。人们之间若说是有什么“交易”，那么，“交易”一般也是采取互惠（reciprocity）和再分配（redistribution）这两种形式达成的。“互惠”的基本原则在于帮助保护生产和家庭生计，它的存在前提是具有高度对称性的社会组织，如氏族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二元组织”。“再分配制度”的典型是“朝贡贸易”，其原则是社会组织具有非对称的中心性（centricity），中心性使货物和服务的收取、储存与重新分配成为可能。这两种经济形态都已被人类学家所研究。在人类史上，还存在过第三种经济形态，即自给自足的“家庭所有制”（householding）。在古希腊，“家庭所有制”被称为是“oeconomia”，是“经济”（economy）一词的词源，这被亚力士多德想象成为金钱而生产相对立的一种理想经济形态。

与历史上所有其他类型的经济形态一样，“自我调节市场”本来也是需要强大的社会力量来维系。然而，19世纪西方“自我调节市场”的确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不知出于何由，社会力量一旦干预到市场，便导致对工业的衰败，最终反过来对社会体系自身的完整性造成更严重的损伤。卡尔指出，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危机，根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是“生产工具的奇迹般的改进”，及其所带来的对人类稳定生活方式（habitation）的破坏。“自我调节市场”成为一个不被控制或自我控制的系统，在西方思想中成为一个信条和乌托邦，它使人误以为：人通过“自我调节市场能得到世俗性的拯救”。然而，历史经验同样表明，市场与组织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之间的冲突，为19世纪西方文明提供了动力，也导致诸多矛盾与压力的加剧，到20世纪终于摧毁了社会，使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发展到非以战争为结局不可的地步。这就意味着，吞噬着社会的“自我调节市场”乃是“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人间悲剧的根本原因。

卡尔·波兰尼在诠释一个逝去的年代留给人类的教诲时，没有落入俗套，没有因此简单化地将“黄金时代”的失落归咎于阴谋家。为了解释导致和平向战争的演变，他具有反思性地考察了推动近代西方文明发展的因素，力求用一种令人乐观的过去揭示出其内在矛盾与限度。他那对“自我调节市场”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由此延伸出来“还市场于社会”的号召，对于我们思考今天的经济生活并没有失去其意义。在我们这个时代，将市场分离于社会之外，似乎已再度成为人们认同的“经济自我拯救”的惟一手段。怎样防范因市场脱离社会而造成的矛盾与压力？怎样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同时维护作为人存在本质的社会性？怎样在维护社会性的过程中避免其中心性的过度膨胀所导致的对个人自由的影响？我以为，这与波兰尼五十年前提出的问题，依旧值得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在二十一年后的今天再探讨。

为，卡尔·波三尼于60年前提出的问题，依旧值得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在60年后的今天来探讨。

[首页](#) |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人才招聘](#) | [学术资源](#) | [友情链接](#)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ICP备案编号：京ICP备05072735号